

协调型环境资源审判模式：内涵、动因、进路

环资审判

◇ 李玲玉 江 勇

近年来，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但与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更重任务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特别是在协同治理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化。当前，环境资源审判主要以裁判方式解决纠纷，还无法完全满足保护环境资源的新要求，需要探索建立一种“协调型环境资源审判”模式。

一、何为协调型环境资源审判模式

从语义上看，“协”取“众之同和”之意，强调多方主体的和谐共处；“调”则指事务的层次与顺序安排。“协调”合为一体，既指“配合得当”的理想状态，也指实现该状态的方法过程。在环境司法语境中，“协调”体现为一种系统性的机制构建，旨在通过职能整合与程序协同，实现公平、效率与生态保护的统一。协调型环境资源审判模式，是指人民法院围绕“修复优先、综合治理、多元协同”的环境司法要求，以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为目标，依托专业化审判体系，通过强化程序衔接、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推动政法系统协同，统筹实现法律效果、生态效果、社会效果与国际效果的新型审判模式。该模式以恢复性司法和协同治理理论为基础，将系统思维融入审判全过程，推动人民法院从传统裁判者转变为环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与协调者。协调型环境资源审判的“协调”内涵，可从以下三个层面加以阐释：

一是主体协调，构建多元共治格局。生态环境治理具有跨领域、跨主体的复合性，仅靠法院难以胜任。协调型审判强调打破司法“孤岛”，推动形成法院与行政机关、检察机关、社会组织和公众协同参与的治理网络。例如，在浙江某球拍公司破产清算案中，法院通过“破产智审”平台与管理部门协同处置危险废物，既落实环境责任，也实现财产价值最大化，是司法协同治理的一个典型实践。

二是实体协调，平衡多元利益关系。环境资源案件常涉及环境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个体权益与公共福祉之间的张力。协调型审判力求在不同价值诉求中寻求最大公约数，避免“非此即彼”的零和思维，推动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例如，在审理企业排污案件时，需兼顾环境修复与企业可持续经营，追求“既要绿水青山，也要民生发展”的共赢结果。

三是程序协调，兼顾效率与公正。环境损害往往具有持续性与不可逆性，司法救济的及时性至关重要。协调型审判在严守程序正义、保障当事人权利的基础上，通过集中管辖、专业审判、证据规则优化等措施，提升审判效

率，避免因程序迟延导致生态损害扩大，实现“公正且高效”的司法输出。

二、提出协调型环境资源审判模式的动因

协调型环境资源审判的提出，源于生态文明时代背景下司法理念和实践机制的深层变革。

1. 落实“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根本要求。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和不可持续发展模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表明，环境保护不再是发展的代价，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前提。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一些裁判没有平衡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容易偏重一端而忽视另一端。协调型审判则倡导法院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高度，依法稳妥处理案件，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理念融入裁判导向。例如，在某气候变化民事公益诉讼中，法院通过调解方式，既落实了生态保护要求，又促进了新能源消纳与绿色经济发展，实现了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展现出协调型环境资源审判在推动绿色转型中的积极作用。

2. 应对环境司法专门化与专业化进程中的现实挑战。当前，环境司法专门化专业化建设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仍面临管辖分散、功能偏差与协作不畅等深层次问题，制约着司法效能的最大化发挥。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管辖机制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不匹配，导致司法保护“碎片化”。生态系统具有跨行政区划的自然属性，如流域、森林、湿地等，其保护需求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当前的司法管辖制度受制于行政区划和审判层级壁垒，导致一个完整的生态单元被人为分割由多个法院管辖，难以统筹考量流域上下游、区域内外整体的环境利益。尽管许多地区推行了环境资源案件的“归口管理”或“三审合一”，但这种整合还没有完全发挥出司法保护的合力。

其二，审判功能定位与生态环境治理的现代需求存在偏差，制约了司法预防与修复功能的发挥。与传统审判模式侧重于对既往纠纷的“定分止争”不同，环境资源审判因其对象的公共性、损害的不可逆性，更应强调对受损生态的修复和未来风险的预防。然而在实践中，受传统司法惯性的影响，一些审判活动仍存在“重责任认定、轻修复落实”的问题，满足于对违法行为进行司法制裁，但对判决后的生态修复效果跟踪监督不足，导致“案结事了了”；以及“重司法制裁、轻系统治理”的问题，侧重于对个案当事人的惩处，而未能通过司法建议、典型案例等方式，深入剖析和解决案件背后反映出的系统性、行业性环境风险与管理漏洞，司法治理的预防功能未能充分彰显。

其三，跨区域司法协作机制尚未系统建立，难以有效应对跨域性环境问题。对于跨省、跨市的水体污染、大气传输、非法转移危险废物等典型环境问题，有效的跨域司法协作至关重要。然而，目前的协作模式多处于自发、被动状态，严重依赖个案推动或依靠上级机关的临时性协调，缺乏稳定、规范、可预期的制度性框架作为支撑。不同地区的法院之间在案件线索移送、调查取证协同、裁判标准统

一、判决联合执行等关键环节，常因缺乏明确的规则指引和操作流程而难以有效衔接。协作过程往往依赖于“人脉协调”或通过临时性会议进行“一事一议”，这种非制度化的工作方式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可持续性弱、可预期性差，无法满足常态化、规模化应对跨域环境纠纷的司法需求，成为环境司法专门化体系建设中的一块短板。

3. 推动环境治理模式向协同共治转型的需求。生态环境损害具有系统性和跨区域特征，仅靠单一主体难以有效应对。对此，必须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司法保障的协同共治格局。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人民法院的角色定位需要实现从“幕后”到“台前”的关键转变。法院不应再仅仅固守传统诉讼中被动、中立裁判者的角色，而应主动作为，成为治理进程的积极协调者、推动者。然而，理想的多主体协同共治在实践中面临严峻挑战。参与主体众多、利益关系错综复杂，若缺乏精细化的程序协调机制和清晰的权责划分，很容易出现责任稀释、相互推诿的现象，以及因沟通成本高昂导致的决策和执行效率低下问题。

4. 顺应国际环境法治的发展趋势。当前，全球环境治理格局正经历深刻变革，气候变化加剧、生物多样性锐减、海洋塑料污染泛滥、绿色贸易壁垒高筑以及跨境环境风险事件频发等挑战相互交织，呈现出高度的全球性、综合性与联动性特征。这些问题的解决远超单一国家的治理能力边界，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传统的、以绝对国家主权为基石的治理范式，在面对此类跨国界、跨代际的复合型危机时，其内在局限性暴露无遗：治理碎片化导致行动步调不一，责任分散化使得“公地悲剧”反复上演，应急被动化则难以应对突发性跨境环境灾害。正因如此，国际社会愈发形成共识，即必须超越孤立应对的模式，在法治框架下构建起全球性的规则协调体系、机制互认网络与责任共担原则，推动形成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国际环境治理新秩序。在此背景下，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不仅是提升环境司法适应力与引领力的内在要求，也是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与全球生态治理格局演进背景下的重要战略任务。

三、实现协调型环境资源审判模式的进路

协调型环境资源审判不仅是一种理念创新，更需要通过制度和机制的落地予以实现。实现这一目标，应从理论基础、制度构建、程序衔接和技术支撑四个维度协同发力，推动环境审判职能从“定分止争”向“参与治理”转变。

1. 树立恢复性司法与协同治理并重的审判理念。协调型审判以恢复性司法和协同治理为理论基石。恢复性司法理念的核心要义在于，将司法裁判的终极目标从对违法者的单纯惩罚，转向对受损生态环境本身的修复与未来风险的预防。它要求司法活动必须以生态系统的健康与完整为核心，追求“受损的环境得到实际修复”这一实质正义，而不仅仅是完成法律上的责任认定。与之相辅相成，协同治理理论则直面环境问题的公共性、跨域性和复杂性特征，强调必须打破部门壁垒和地域界限，通过跨主体、跨区域的合作共治，整合司法、行政、企业、社会公众等多元力量，形成治理合力。将这两种理

念有机结合，能够有效突破传统司法“条块分割”“就案办案”的固有局限。恢复性司法确保了治理的“深度”，即真正触及环境损害的根源并进行修复；协同治理则拓展了治理的“广度”，即动员最广泛的力量参与其中。二者的结合，共同赋予了环境司法系统化的整体视野和前瞻性的风险防控能力，使其从社会关系的“后端修复者”转变为生态文明的“前端守护者”。

理念的革新要求角色的重塑。与之相适应，环境资源审判人员要转变单纯“坐堂问案”的裁判者角色定位，认识到自身是生态文明建设这一系统工程中的关键一环，增强服务生态治理大局的主动意识和综合能力，努力成为把握生态规律、善于沟通协调、能够推动系统治理的“生态法官”。为实现这一转型，必须加强审判队伍的能力建设，可以通过系统的专题培训，深化对生态学、环境科学等跨学科知识的理解；通过搭建法学与生态、经济、社会等学科的交叉研讨平台，促进知识结构的更新与融合；尤为重要的是，要通过深入总结和研析典型案例，从实践中提炼裁判规则与方法，使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司法智慧。最终目标是提升参与现代环境治理的综合能力，锻造一支既精通法律又胸怀大局的现代化环境资源审判队伍。

2. 推进环境审判专门化与专业化制度建设。一是构建符合生态系统内在规律的专门管辖机制。探索以自然生态单元为核心的集中管辖模式，避免司法保护“碎片化”，统筹考量区域内整体环境利益。例如，对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等重要水系，可设立专门的流域法院，并实行集中管辖；对重要的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生态功能区，亦可跨行政区划设立生态法庭。此举旨在破解行政区划与审判层级对司法保护效能的制约，实现从“按行政界线办案”到“按生态规律办案”的转变，为生态环境的系统性、整体性保护提供司法组织保障。二是推动审判功能从“重制裁”向“重修复”转变。环境司法的根本目的不应止于对违法行为的惩处，更在于使受损的生态环境得到最大程度的修复。这就要求深化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三审合一”的归口审理机制，超越三类诉讼程序“物理叠加”的初级阶段，实现实质融合。例如，在审理污染环境案件时，需明确民事赔偿（用于修复）、行政处罚（体现惩罚）与刑事罚金（严厉制裁）之间的顺位关系，优先保障修复资金的落实。其最终目标是实现责任认定与生态修复效果之间的动态平衡，让司法裁判的落脚点真正体现在环境质量的改善上，而非一罚了之。三是推进跨区域司法协作的常态化与制度化建设，破解跨区域环境治理难题。面对跨省界的污染转移、流域性生态破坏等问题，临时性、个案性的协作远远不够。可以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重点案件办理为契机，将实践中之有效的协作方式总结、固化为长效制度。这包括完善常态化联席会议制度，定期通报情况、研判风险；建立协同研判机制，对跨区域复杂案件统一法律适用尺度；搭建安全高效的信息共享平台，实现线索移送、证据互认、文书送达的互联互通。

3. 完善诉前、诉中与诉后程序衔接机制。在诉前阶段，核心任务是建立高效的预防与联动机制，推动纠纷源头化解。法院要主动前移关口，通过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以及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行政主管部门建立常态化联席

会议制度，定期通报环境风险、研判执法难点。健全案件线索双向移送机制，确保行政执法中发现的涉嫌犯罪线索能及时进入司法程序，司法审判中发现的管理漏洞也能反馈给行政机关。同时，积极运用庭前调解和矛盾化解机制，引导当事人通过承担修复责任等方式解决纠纷，避免环境损害的扩大。在诉中阶段，关键在于借助专业力量，攻克环境案件的技术难题，确保裁判的科学性与公正性。环境资源案件往往涉及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如污染机理、损害程度、修复方案的可行性等，这远超法官的一般知识范畴。因此，必须积极引入环境科学、生态学等领域的专家作为辅助人，为法庭提供专业咨询；依托权威的第三方评估鉴定机构，对损害事实和修复成本进行科学量化。通过这些措施，辅助法官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制定既符合法律又尊重科学规律的修复方案，为作出公正裁判奠定坚实基础。在诉后阶段，重点是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修复执行机制，确保司法裁判的生态效益真正落地生根。判决的作出并非终点，生态修复的落实才是最终目标。法院需从“裁判者”延伸为“监督者”和“协调者”，推动建立由法院主导、行政机关监督、专业机构执行、社会公众参与的多元共治格局。例如贵州古楠木案的判决就展现了诉后阶段的协同治理价值，法院在依法追究肇事者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同时，并未止步于个案纠纷的解决，而是针对案件暴露出的古树名木保护漏洞，向相关主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这一举措成功推动了林业、住建、文旅等多部门联合出台规范性文件，共建古树名木长效保护机制。此举实现了从“惩治一个破坏者”到“守护一整类资源”的升华，标志着环境司法从单纯的个案裁判向推动制度建设与系统治理的深刻转型，真正体现了协调型审判参与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功能。

4. 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接轨国际环境司法趋势。一方面，应推动国内司法与国际环境条约、区域合作机制衔接，提升我国在涉外环境纠纷、跨境污染和绿色贸易争端等案件中的司法适应力与话语权。另一方面，应在裁判理念中融入恢复性司法、预防性保护等新的国际趋势，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国际影响力的绿色裁判范式。云南法院审理的“绿孔雀”栖息地保护案，是这一路径的典范。该案的核心突破在于，它成功超越了“有损害才有救济”的传统侵权法思维定式，将司法保护的介入时点提前至生态环境面临重大风险但损害尚未完全显现的“预防期”。法院经审理认为，在建水电站项目对极濒危物种绿孔雀及其赖以生存的热带季雨林生态系统构成重大风险，判决支持了预防性公益诉讼请求。此举不仅将“生物多样性价值”作为独立的、优先的司法保护客体予以考量，更在实践中确立了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司法中的适用规则。正因如此，该案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列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十大典型案例之首。

总之，协调型环境资源审判模式的提出，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环境司法主动回应国家战略、破解现实难题的必然选择。它要求法院实现从裁判者到治理者的职能转型，打破部门、区域与国际界限，通过理念、机制与程序的协同，推动环境治理走向系统化与可持续。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第三人撤销之诉改判或撤销前案判决，前案诉讼费用应否退还

问题探讨

◇ 黄海啸 张璟玥

第三人撤销之诉中，最终判决撤销或者改变前案结果的，前案诉讼费用是否应当退还？此问题虽小，但在实践中却存在争议，值得分析探讨。

探讨该问题的前提有二：其一，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性质及原审文书的效力。对此，比较法及我国学界中有“绝对效力”与“相

对效力”之争。但从实证法上看，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八条等相关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是一项“纠错”的制度，作为形成之诉，为达到定分止争的效果，应当认为其裁判结果一经作出即产生绝对效力，原判决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失去拘束力，从而产生应否退费的问题，否则，如果认为前案的实体审理与最终处理结果仍然有效，自然没有改变或者退还前案诉讼费的余地。其二，案件实体审理与收取诉讼费的关系。诉讼费有双重面向：一是调整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纵向关系；二是调整当事人诉讼费用负担的横向关系。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相关规定精神，一般只有耗费了司法资源，完成了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纵向关系处理后，才会涉及当事人之间有关诉讼费用成本分担的问题，例如裁定驳回起诉的案件应退还当事人已缴纳的诉讼费用、二审发回重审案件的上

诉讼费退还等。可见，对“同一纠纷”尚未作出最终的实体生效文书，还需要继续审理的，原则上应当退还当事人已预交的案件受理费。

从司法实践情况看，运用类型化方法，可以将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处理结果分为以下五种情形：一是第三人无权且原审文书无错误，应判决驳回第三人诉求；二是第三人无权但原审文书完全错误，应撤销原审文书；三是第三人无权但原审文书存在部分错误，应部分撤销原审文书；四是第三人有权且原审文书完全错误，应完全改判；五是第三人有部分权利且原审文书存在部分错误，应部分改判。故结合前面的论述，可知这里可以去掉第三人诉求完全不成立的情形（前案文书内容以及相应的诉讼费承担无须变动），第三人诉求部分成立（可参考完全成立的处理方案按比例处理），而集中讨论在第二种与第四种情形下，诉讼费如何处理的问题。具体而言：

一是在全部改判的场合。此时原生效法

律文书因被撤销而丧失效力，诉争事项已经在新的判决书中一并解决，第三人与前案当事人之间重新确立了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前案当事人不得另行起诉。故前案当事人及第三人应按照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最终结果来明确两次诉讼费用承担事项，即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诉讼费用由两被告共同承担，前案诉讼费用由前案原告承担，但不应退还前案诉讼费用。理由在于：其一，前案争议诉讼标的的处理结果有实质性变化，故前案的诉讼费用也应当改变（类似二审改判）；其二，前案当事人对前案文书错误的产生具有共同的责任，故应共同承担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诉讼费用；其三，纠纷已经解决完毕，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已经完成，前案的诉讼费用不应退还。

二是在全部撤销的场合。如果第三人撤销之诉仅仅撤销了前案文书而未作出确权判定，则前案所审理的民事法律关系纠纷并未获得终局性解决，前案当事人还可以另行起诉。此时，前诉案件的诉讼费应当退还前

案原告。理由在于：其一，在收取诉讼费的法理基础上，诉讼费用是为纠纷解决“买单”，如果第三人撤销之诉仅仅撤销了前案文书而未作出确权的判定，则前案所审理的民事法律关系纠纷并未获得终局性解决，理应退还诉讼费；其二，在留存诉讼费的依据上，第三人撤销之诉判决在效力上的对世性、绝对性，使得前案法律文书被撤销后即在前案当事人之间失去了效力，前案诉讼费用因此无须在双方之间进行分担，国家也就没有继续保有前案诉讼费用的基础；其三，这也符合《诉讼费用交纳办法》所确立的退费原则，此处不再赘述。

综上，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判决若改判或撤销前案判决，因案件中权利义务最终分配有变，前案的诉讼费承担事项理应以调整，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退还，并在后案的判决书中对前案诉讼费负担事项一并作出处理。

（作者单位：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中国政法大学）